

宋代明州与高丽

王力军 著



科学出版社

宋代明州与高丽

王力军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明州即今日宁波，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城。宋神宗熙宁年后，为了抗击辽国，收复北方失地，推行“联丽制辽”的外交政策。由于北方先后为辽、金所据，传统通往朝鲜半岛的官方航线受阻，因此，熙宁以降，明州成为宋廷规定的与高丽官方往来的唯一合法港口。宋朝与高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友好往来基本都是通过明州而完成的。所以，对于这一时期明州与高丽的有关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主要包括宋代以前中国江南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历史，北宋初期、中期、晚期的明州与高丽，南宋时期的明州与高丽等内容，将明州与高丽的友好往来，纳入这一历史时期东北亚国际视野内分析、考察。并就宋代明州与高丽间所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书适合于从事历史、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学者与爱好者阅读与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明州与高丽 / 王力军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03-030831-3

I. ①宋… II. ①王… III. ①中朝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研究 - 宁波市 - 宋代 IV. ①D829.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0446 号

责任编辑: 宋小军 曹明明 / 责任校对: 桂伟利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陈 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 年 5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 1/2

印数: 1—1 200 字数: 329 000

定价: 1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宁波古称明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依山濒海，自西而来的余姚江和由南而北的奉化江在宁绍平原的东部交汇成甬江，逶迤出海。境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腹地广阔，河网交织，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丰富而悠久的区域历史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一颗耀眼的明珠。

在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前，这里已是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从某种意义上讲，宁波的区域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对外交流史，一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以宁波为枢纽港的中国文化，漂洋过海，发散到亚、非各地，特别对隔海相望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文化演进，有着很深的影响。

中国与朝鲜半岛陆地相连、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交流，源远流长。上溯至远古，宁波先民可能就乘坐着竹筏或独木舟，漂流到朝鲜半岛南端，开始描画两地间的海上航线。至唐代，明州已发展成为东亚海上大港，来自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甚至北非的商贾、僧侣麇集三江，为浙东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0世纪初至13世纪末叶，我国的宋朝与朝鲜半岛的高丽间的交往，无疑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中最丰富的篇章之一。而明州，在宋丽全方位交流中起到了枢纽作用。宋代明州与高丽的交往史，已经超越了地域史的范畴，是构成古代东亚关系史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全书共分六章，前五章按时代划分，通过对每一阶段东北亚国际局势变化的考察，将明州与高丽的友好往来置入国际视野观察，对宋丽交往史的发展演变轨迹作了简要梳理。基本上还是以时间为顺序，细致梳理相关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和结果，并对一些重要的事件及历史现象予以分析和研究。第六章相关问题探讨，从宋代明州与高丽交往史的一些焦点问题入手，详细探讨这些问题产生的内在规律和历史渊源。

第一章，宋代以前中国江南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历史。通过对河姆渡文化与稻作农业东传的考察，借助有关中朝两地考古资料的佐证，推测验证了史前时期中国江南就已经与朝鲜半岛建立了一定海上联系的史实；通过对浙东地区早期的水上活动观察，证实在春秋时期，中国人已经有目的的航行到朝鲜半岛，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海上交流。至唐、五代，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东亚文化、贸易交流占绝对优势的通道，地处东海之滨的明州，已经发展成为面向东亚的核心港城。

第二章，北宋初年的明州与高丽。通过对北宋初期东北亚国际局势的研讨，以及对宋、辽、丽三国的首次博弈考察，论证了影响东北亚长达 200 多年外交关系流变的渊源；以出口为主的海外贸易方式和区域经济、特别是商业的繁荣，催生明州市舶司的建立，并奠定明州在东亚贸易圈中的核心地位；由于宋初通往高丽的官方港口集中在北方山东半岛，明州港民间的贸易、文化交流成为中国江南与朝鲜半岛往来的主要方式。

第三章，北宋中期的明州与高丽。北宋中期，东北亚国际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为了适应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需求，各国适时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辽国通过一系列对宋、高丽的战争，取得东北亚霸主地位。宋神宗主动恢复中断数 10 年的宋丽官方联系，推行厚待高丽使节的亲丽外交，实施“联丽制辽”的战略方针。高丽重回“华夏宗主国”体系，出于政治、经济需要，以“二元朝贡制”方式，频繁向辽、宋派出使节，小心翼翼在大国间寻找平衡。由于北方航线被辽国阻绝，明州成为宋丽官方往来的唯一的寄泊地。明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得到提升。宋廷出使高丽的使节，乘坐了明州首次打造的“神舟”巨舰，掀起了宋丽交往史的又一高潮。

第四章，北宋晚期的明州与高丽。12 世纪初，女真所建的金国异军突起，取代辽国成为东北亚新的霸主。熙宁以来，一直作为宋丽往来口岸的明州，因承办丽务，给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建设等带来深刻影响。明州高丽司的设置、高丽使行馆的建造、宣和年间大规模的奉使高丽活动，进一步提升了明州的政治地位，却也给明州地方政府与百姓带来沉重负担。元祐年间，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官吏，开始对熙丰以来不加节制厚待高丽的政策进行了反思，宋廷修正了部分高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州地方负担。而哲宗亲政后的政策反复，使得亲丽政策再回熙丰水平。徽宗时期成为

宋丽交聘的又一个高峰。

徽宗朝从“联丽制辽”到“联金灭辽”再到“联丽抗金”，外交政策既缺乏慎重考虑，又缺少实际操作的可行性，最后北宋为金所灭。

在北宋存续的 167 年间，宋丽双方经过了初期的正常交聘、中期的停滞动荡和晚期的密切繁荣，关系始终处于时断时续的间歇性状态。宋丽关系的亲疏，始终受到北方政权的影响，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双方始终没能形成有效的军事联盟。但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层面交流，双方加深了沟通，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延续了自古以来的传统友谊。

明州，作为宋廷指定的唯一官方往来口岸，无论对区域政治地位的提高、商贸活动的繁荣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文化发展与传播，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五章，南宋时期的明州与高丽。金灭辽后，东北亚新的三国再次形成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三角关系。三国间任意两国关系的改变，都将波及第三国，甚至对其造成致命的威胁，从而改变东北亚政治格局的稳定。宋丽之间的外交关系在杨应诚出使无功而返后转入低潮，北宋长期经营的“联丽”政策彻底失败。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君臣对高丽开始充满了疑虑与防范，关系渐行渐远，并于隆兴二年（1164 年）彻底断绝了官方往来。有限的消息，唯有通过明州地方政府和从未停歇的民间海商来传递。明州（庆元）经历了宋丽官方通交的鼎盛至衰亡的全部过程。

经建炎兵燹而浴火重生的明州，因毗邻临安都城，由历史上的边鄙之地，一跃成为近畿重地、东南门户，明州的国防之责、赋税之出、市舶之重、文化之厚，都使这座港口城市，在南宋一代有着尤为突出的地位。

第六章，相关问题探讨。研究的专题分为多个方面，有“宋代明州与高丽的海上贸易”、“明州与高丽的佛教文化交流”、“明州地方政府、商人在宋丽交往中所起的作用”、“明州市舶司相关问题”、“宋代客馆制度中的高丽使馆”、“宋朝接待高丽使臣制度的流变”、“宋代明州的高丽漂民”等，详细探讨了每一个问题的历史渊源和内在规律，是笔者在学习这段历史时的认识和体会。

中国和韩国都处在世界的东方，两国之间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时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长期使用着同一种文字，政治制度、文化体系、民族情

感等，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温故而知新，作为近邻，中韩两国必须充分了解彼此的历史，以史为师、以史为鉴，深切沟通，彼此尊重，构建东北亚和谐、稳定、繁荣的国际秩序，共同迎接美好的未来。

半个多世纪以来，朝鲜半岛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北南并立。宋代中国江南地区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主要涉及今天半岛南部地区，为了叙述方便起见，书中一般按照国内习惯，或提“中朝”、或言“中韩”，都无其他特别意义。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宋代以前中国江南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历史	(1)
第一节 河姆渡文化与稻作农业东传	(1)
一、河姆渡文化	(2)
二、稻作农业东传	(4)
第二节 浙东地区早期的水上活动	(7)
一、吴越先民的水上活动	(8)
二、秦汉时期浙东的海上活动	(11)
三、三国到隋末中国江南与朝鲜半岛的交往	(13)
第三节 唐代中国江南与新罗的交往	(16)
一、明州与新罗航线的确立	(17)
二、新罗张保皋商团	(19)
第四节 吴越国与高丽的友好往来	(21)
一、高丽初期与中国的海上交流	(22)
二、吴越国与高丽的友好往来	(23)
第二章 北宋初年的明州与高丽	(28)
第一节 北宋初期东北亚国际局势	(28)
一、契丹崛起于北方	(29)
二、东北亚三国的首次博弈	(30)
三、东北亚三国的再次博弈	(34)
第二节 宋初的明州与高丽	(39)
一、宋初明州的政治、经济	(39)
二、宋初通使高丽的北方航路	(41)

第三章 北宋中期的明州与高丽	(44)
第一节 宋、丽恢复官方往来	(45)
一、“联丽制辽”政策的提出	(45)
二、宋、丽恢复官方往来	(48)
第二节 安焘由明州出使高丽	(55)
一、出使前的诸多准备	(56)
二、安焘从明州起航	(59)
第三节 元丰年间的明州与高丽	(63)
一、明州成为宋、丽官方往来的唯一港口	(63)
二、杨景略出使高丽	(65)
第四章 北宋晚期的明州与高丽	(69)
第一节 北宋晚期东北亚国际局势	(69)
第二节 元祐年间对高丽政策的反思	(73)
一、苏轼的高丽观	(74)
(一) 促使年号案	(74)
(二) 却施金塔案	(76)
(三) 不许高丽购书案	(78)
二、对苏轼高丽观的评价	(80)
三、宋人对亲丽政策的反思	(84)
四、哲宗亲政后的高丽政策	(86)
第三节 徽钦时期的明州与高丽	(91)
一、明州建造高丽使行馆	(93)
(一) 政和前的明州与高丽	(93)
(二) 楼异主政明州	(97)
附一：《宋徽宗御笔碑》	(105)
附二：《宋徽宗省降御笔碑》	(107)
二、奉使高丽的高潮	(107)
第五章 南宋时期的明州与高丽	(116)
第一节 南宋初年的明州保卫战	(117)
第二节 南宋与高丽关系的演变	(120)

一、杨应诚出使高丽	(121)
二、最后的官方往来	(124)
第六章 相关问题探讨	(130)
一、宋代明州与高丽的海上贸易	(130)
(一) 明州成为宋、丽官方政治及贸易往来的唯一港口	(130)
(二) 官方贸易	(136)
(三) 民间贸易	(145)
(四) 贸易商品的种类	(148)
二、明州与高丽的佛教文化交流	(155)
(一) 早期的交流	(155)
(二) 宝云大师——义通	(158)
(三) 义天入宋求法	(161)
(四) 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的交流	(167)
三、明州地方政府、商人在宋丽交往中所起的作用	(171)
(一) 明州地方政府的外交作用	(171)
(二) 明州商人在宋、丽交往中所起的作用	(178)
四、明州市舶司相关问题	(180)
(一) 关于唐代明州市舶使(司)	(181)
(二) 宋代明州市舶司	(184)
(三) 宋代海外贸易法	(192)
五、宋代客馆制度中的高丽使馆	(195)
(一) 宋代以前中央客馆制度	(195)
(二) 宋代中央客馆制度	(196)
(三) 明州高丽使馆的功能及意义	(202)
(四) 高丽使馆变迁与探寻高丽使馆遗址的考古学努力	(204)
六、宋朝接待高丽使臣制度的流变	(209)
七、宋代明州的高丽漂民	(216)
后记	(221)

第一章 宋代以前中国江南 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历史

基于陆地相连、隔海相望的地理原因，中国与朝鲜半岛自远古起就存在着密切关系。目前的考古发现证明，距今 60 万 ~ 40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黑隅里遗址”时期^①，朝鲜半岛北部的考古学文化就与中国东北大陆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石器器型以中、小型居多；打片石器占绝大多数；打片方法以锤击为主；特别是晚期的器物渐趋细小化并以压削法为基本加工方法；出现了铅笔头形和楔子形的石核；石器加工普遍从单面加工向两面交互加工过渡^②……这些共同点充分表明中朝两地文化性质的相近，反映了朝鲜半岛与亚洲大陆间文化的密切联系^③。进入距今 1 万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中国东北、华北与朝鲜半岛发现的考古学文化表明，两区域间的联系更加紧密^④。而宁波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有关发现，则反映了史前时期中国江南就已经与朝鲜半岛建立了一定海上联系的事实。

第一节 河姆渡文化与稻作农业东传

20 世纪 70 年代发现的河姆渡文化，无疑是 20 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重大

① 姜孟山：《朝鲜通史（第一卷）》，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 年。

② 张镇洪：《辽宁地区远古人类及其文化的初步研究》，《古脊椎动物学报》1981 年第 2 期。

③ 郭大顺、张星德：《早期中国文明——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

④ 都有浩：《有关古朝鲜若干问题的商榷》，《文化遗产》1966 年第 4 期。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贺剑城译：《朝鲜通史》，1956 年。金健人：《古代东北亚海上交流史分期》，《社会科学战线》2007 年第 1 期。

的考古发现之一。宁波地区的余姚江流域是该考古学文化的核心，迄今发现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大多分布于这一地区。河姆渡文化是宁波地区一切文化最深层次的堆积，成为探索本地区文明的源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打破了长期以来黄河流域单一中华文明起源地的学说，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与文明发祥地，其人工栽培水稻遗迹的发现，为世界水稻起源问题的研究带来革命性的突破，影响深远。

一、河姆渡文化

定居，是史前人类改变自身生存条件的一种进步。为适应江南低洼潮湿的居住环境，河姆渡人选择在背山面水的山前台地搭建底部悬空的“干栏式”建筑。榫卯、企口板和双榫插板技术，不仅安全稳固，也使居住空间扩大；地板以企口板拼成，平整牢靠；墙壁用芦苇编织物制作，简便实用。甚至一些构件上还雕刻了图案。河姆渡的干栏式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里程碑式的创造。

河姆渡人利用宁绍平原丰富的自然资源，继续保持着采集果实和捕鱼狩猎的主要生活方式。其渔猎工具分为骨器、石器和木器。发现最多的是骨箭镞，多用动物的肢骨磨制而成。其他有投掷用的陶弹丸、石弹丸、石球，击杀用的木矛、渔镖，以及狩猎时鸣吹的骨哨。由于获取食物的不确定性，对捕获的活体动物进行圈养或人工驯养，这是宁绍平原原始畜牧业的开端。

制陶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河姆渡文化极富地域特色的夹炭陶，是在黏土中掺和大量的植物茎叶碎末、谷壳等有机物，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制坯，置于约800°的火温下烧制而成。夹炭陶器之特点为色偏黑、质松软、胎厚量轻，既用于盛贮，又用作炊具。

从出土的纺织工具和部件可以发现，河姆渡人利用自然资源，熟练地掌握了提取植物纤维、纺（捻）线和使用踞织机编织等整套原始纺织工艺。通过纺织和编织，改变自己的衣着条件。

河姆渡人留下了许多用骨、石、木、陶等不同材质雕刻的艺术品，造型丰富，技术运用娴熟，反映了先民对大自然的具象思维能力和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在发展演变的岁月里，鸟的图符始终处于原始艺术创作的核心位置。

已经发掘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均出土了大量骨、木、石等材质的农具，反映出当时农业的发展程度。特别是骨耜的发现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耜耕

农业已经开始，从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第一期开始，精耕细作的就已经是人工栽培的水稻。

长达近2000年持续发展的河姆渡文化，农业始终占据着首要地位。从当时的地理环境、土质和气候条件来看，河姆渡遗址所处的地带是非常适宜人类居住和进行农耕的。事实也证明了河姆渡先民曾在这块肥沃的原野上进行过辛勤的劳动，从事古老的稻作农业活动，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活动，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河姆渡遗址早期地层堆积中的植物遗存，主要包括芦苇茎叶、水稻茎叶、秕谷稻壳、木屑木片等。有的地方秕谷稻壳层层叠压，从稻秆稻叶到秕谷稻壳，出土时颜色鲜黄，保存犹新，外形完好，甚至颖壳上的隆脉和稃毛也清晰可辨，有的稻谷还同枝叶共存。水稻遗存数量之多，质量之好，为其他同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址所罕见。同时，在一些灰烬堆积中也发现过不少炭化了的粒粒大米。在不少陶釜内底，留有烧焦了的米粒或“锅巴”。在夹炭陶片的陶胎中，也可见到一颗颗谷壳形状。在第一期文化的一件敛口陶钵腹壁饰有稻穗纹和猪纹图像，一株稻穗居中，直立向上，沉甸甸的稻谷向两边下垂。如果河姆渡当时没有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制作这样的画面是很难想象的。研究者一致认为，河姆渡文化所发现的稻谷属人工栽培水稻无疑。

1982年，严文明先生研究认为，稻谷栽培起源于中国的杭州湾和长江三角洲地区^①。观点一经提出，随即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开始有更多学者将目光投射到稻作农业起源问题上来。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比河姆渡栽培稻年代更早的古稻谷频频发现，其中主要有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②、湖南澧县的彭头山遗址和道县玉蟾岩（俗称蛤蟆洞）遗址^③、江西万年的仙人洞遗址下层^④。这些遗址的年代均在

①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

② 陈报章、张居中、吕厚远：《河南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水稻硅酸体的发现及意义》，《科学通报》1995年第4期。

③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张文绪、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初步研究》，《作物学报》1998年第4期。

④ 曹柯平：《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存再研究及中国稻作农业起源新认识》，《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

八九千年，有的甚至超过万年。考古学的新发现将稻作农业的起源地扩展到更广阔的区域。

但是这些古稻谷所属的各考古学文化，属于不同谱系，它们之间缺乏密切的文化交往，因此，不能仅仅以时间的早晚来认定稻作农业先源于长江中游，而后向长江下游地区传播，也就是说，它们的发现并不能改变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也是栽培稻最初起源地之一的观点^①。尤其是中外学者利用电镜扫描技术对河姆渡炭化稻谷进行的显微结构的研究，发现四粒普通野生稻炭化谷粒，从而有力地证实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周围就生长有普通野生稻^②。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应该就是土生土长于宁绍平原的，大量的稻谷及成套农具的存在，反映了当时稻作农业的进步。

二、稻作农业东传

随着考古发现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对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早期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在时间早晚及植物学上的遗传特征等研究，目前中、日、韩三国绝大多数学者基本认为：稻作农业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产生后，不仅向中国大陆其他地方传播，也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日、韩两国的稻作文化都渊源于中国稻作文化的东传。至于传播的途径，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合分类不外乎“陆传”与“海传”两条途径。所谓“陆传”，即通过陆地传至东北、或陆路传至山东半岛，越渤海经辽东半岛，再扩散至朝鲜半岛。此说在学术界提出最早，影响较大，在空间传播次第的难易程度也较为符合当时的认知与技术水平，但在考古学上尚缺少有力的支持，近年来已鲜有持此观点者。随着“陆传说”渐次沉寂，近年来“海传”之说得到重视并逐渐得到考古学、遗传学说等研究的有力支持。有日本学者认为稻作文化是由中国大陆传到沿海的岛屿台湾、琉球，再经冲绳传到日本九州地区。通过对海南岛、台湾地区以及日本、菲律宾、东部印度尼西亚等地稻谷的遗传基因研究，从遗传学角度肯定了日本热带粳稻源于东南亚诸岛，经菲律宾、

① 以上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② 汤圣祥、〔日〕佐藤洋一郎、俞为洁：《河姆渡碳化稻种普通野生稻谷粒的发现》，《农业考古》1994年第3期。

琉球诸岛，从冲绳传入南九州的路线^①；或起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技术传入朝鲜半岛，然后逐渐扩散到日本列岛；中国学者安志敏认为：“由于长江中下游是稻作起源和发达的中心，通过海路直接输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舟山群岛出土的红烧土中也有稻谷的印痕，或可作为稻作东传的中继点。”^② 无论哪种说法，有一点是共同的，东北亚稻作农业的源头就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宁波地区则极有可能是稻作农业东传的始发地。

稻作农业的东传，是一种文化现象，并非一般动植物仅依靠自然之力传播即可繁衍，除了种子，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等还必须依靠人类本身实现传播，没有人的迁徙、流动，农业技术得不到推广，稻作农业东传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伴随着稻作东传之路，一定还有人员的往来。

茫茫大海在空间上隔绝了人类的交往，从距离上增加了彼此沟通的困难。但海洋又是流动的，流动的海洋又能将隔绝的文明推向彼此，空间的距离在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下，会越变越短，从某种程度上讲，长距离的往来，海洋比陆地更为容易，文化交流更为直接，产生的结果更为巨大。在远古，由于人类驭水能力所限，主动发生的、有目的地性质的、远距离航海十分困难。今天，众多的考古发现与动植物研究结果表明，远古时期的海洋，不同文明之间早有联系，存在着交流，推动这些文化间海上交流的“上帝之手”，就是大自然自身的运动方式之一——洋流。

地球上的洋流按温度不同，可分为暖流和寒流，并按是否在水面流动，可分为表流和潜流。我国渤海、黄海、东海的洋流主要是由黑潮暖流和沿岸流两个流系组成，具有气旋式环流的特征。其中黑潮流系是由黑潮主干及其分支（台湾暖流、对马暖流和黄海暖流）组成，沿岸流系自北向南主要有辽南沿岸流、辽东沿岸流、渤海沿岸流、苏北沿岸流和闽浙沿岸流，沿岸流系的季节变化除受大陆径流变化的影响外，还受季风变化的影响，与季风变化相一致。在11月至翌年2月，在强烈的北向冬季季风的作用下，由北向南的沿岸流系最强，扩展范围最大；在3~5月季风的过渡月份中，南向的沿岸流在整个沿海都由强变弱，并向北收缩至杭州湾附近；6~8月为夏季南向季风

① [日] 佐佐木高明：《日本文化の多重构造》，小学馆，1997年。

② 安志敏：《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和东传》，《文物》1999年第2期。

的盛行期，杭州湾以北的沿岸流，虽然还是自北向南，但已变得比较弱了，而在杭州湾以南，东海、南海的沿岸流与外海暖流系统汇合在一起，自南向北流动；9、10月也是季节转换期，即夏季季风逐渐被冬季季风代替，自北向南的沿岸流又逐渐增强，并向南扩展。

实现黄海、东海周边各地的联系的动因，就是存在于黄海、东海海域的洋流与季风。在季风和洋流的影响下，海上遭遇不测的漂（飘）民，毋庸置疑应该是最早开创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海上交往的实践者。虽然现在我们无法查考，最早漂往彼岸的是哪一方、又是何人？不过，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结果，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即浙江地区居民，是最早从陆地走向海洋的民族。“特别是中国首创的竹筏，体轻，抗折，它随着百越人的海上活动，最远传到了拉丁美洲的秘鲁沿海一带”^①。

众所周知，位于浙江东部宁绍平原的河姆渡遗址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土了木质船桨和陶舟^②。2002年11月在浙江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又发现了独木舟及相关遗迹，发掘出的独木舟残长5.6米，宽约0.53米。东北端的船头宽约0.29米，略上翘。经¹⁴C测定，其年代距今达8000年左右。这是目前发现的国内最早的独木舟相关遗迹，被誉为“中华第一舟”^③。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独木船。它和河姆渡、钱山漾等多处遗址中发现的木桨，都说明长江下游的杭州湾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水上航行已经相当普遍。这种航行不仅仅局限于内河湖泊，而且早在河姆渡时期就已经发展到海上了”^④。

为了探索中韩两国海上交流史，也为了验证历史上中韩海上交通路线的开通，1997年中韩跨海漂流学术探险队开展了无动力竹筏科学漂流探险活动。漂流队乘坐的竹筏系来自宁波本地所产毛竹捆扎而成，竹筏长约10米，用了80根大毛竹，总重量达2000多公斤，没有安装任何动力设备，仅仅依

① 中国航海学会：《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③ 蒋乐平、朱倩、郑建明、施加农：《跨湖桥遗址发现中国最早独木舟》，《中国文物报》2003年3月21日。王心喜：《中华第一舟——杭州跨湖桥遗址古船发现记》，《发明与创造》2005年8月。

④ 毛昭晰：《先秦时代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海上交通初探》，《东方文博》第10辑，2004年。

靠洋流的推动，从浙江朱家尖到韩国的大黑山岛只用了16天时间，期间还遭遇到台风的干扰^①。此次活动令人鼓舞，也发人深省。

探险活动的成功，验证了无动力竹筏漂流的可能，佐证了远古不同地域集团在辽阔大海隔绝下存在联系的事实，推测验证了中国江南与朝鲜半岛南部海上交往应不晚于新石器时代的可能，这为江南稻作传入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途径、时间^②，以及浙江地区独有的南方型支石墓与韩国支石墓之间的联系等一系列不解之谜，打开了佐证之门^③。

第二节 浙东地区早期的水上活动

宁波地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至夏商时期。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06年楚灭越，宁波平原作为越国的腹地，成为支撑其图霸中原的经济后方。进一步成熟的稻作农业、发达的青铜技术、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的制作、造船与航海技术……从各个侧面反映了越国经济鲜明的文化特色。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在越国东部边陲句余之地（今宁波江北区慈城镇王家坝村一带^④），建筑城堡以彰显自己的丰功伟业，该城堡被称为“句章”。句章城依山临江，是文献记载宁波地区最早的城堡，是西汉至三国时期浙东地区的通海城邑，并且说明当时已具有集结锚泊较大规模战船群的能力。句章故城还是我国最古老的海港之一，宁波港城是从句章港城开始萌芽的。

秦汉时期，在当时的“海涯鄙地”甬句地区设置了鄞、鄞、句章、余姚四县。但自秦至西汉建国后的200余年间，中央王朝对浙东的开发并不重视，

① 金健人：《中韩千古第一漂》，《当代韩国》1997年第3期。

② 吕洪年：《中国稻作的起源与向韩国的传播》，《韩国研究》第三辑；《韩国民俗学家来我国讲学考察》，《民俗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金健人：《中韩海上交往史探源》，学苑出版社，2001年。毛昭晰先生根据浙江温州地区发现的石棚遗迹与朝鲜半岛南部支石墓的比较研究和浙江东北舟山群岛所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海流、季风等自然因素，提出了史前时期中国江南文化与朝鲜半岛早期文明存在着海上联系，而浙东舟山群岛和温州的瓯越文化则是这一联系纽带之一。《先秦时代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海上交通初探》，《东方文博》第10辑，2004年。

④ 《历时6年多，找到宁波最早城市句章故城》，《宁波晚报》2009年6月24日。